

# 我們是否要接受一個 同質化世界？

● 韓毓海

有人把「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失敗，看作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類遺產。更有人據此進一步斷言：這種失敗意味着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但是，需要問的是：這是一種甚麼意義上的失敗和甚麼東西的失敗？我認為，這是一種在世界範圍內，強力推行一種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信仰、特定的意識形態、特定的政治經濟制度的作為的失敗，是在世界範圍內強力推行和製造一種「同質化」的時間和高度「同質化」的空間的「全球化」行為的失敗，是強力製造統一的「現代世界歷史」行為的失敗，這是「總體性的現代性方案」失敗的一個面相。但是，對這個「現代性」方案的堅持，卻並沒有因為這種失敗而告終。因為，今天正是資本主義要建立統一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強力，正是全球資本主義在一如既往的推行這個「未完成的方案」。

現代性的「世界大同」理想，被馬克思理解為整個世界合併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過程。這個過程不但是經濟過程，也是文化過程。因為所謂「世界空間」，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而形成的，這種「世界空間」的

開拓和以資本主義發端的「世界時間」，導致了「現代世界歷史」觀的形成。在這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觀的視野裏，一種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信仰、特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將變成「普遍的」並被認同為唯一的價值。

但是，如果考慮到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經驗，那麼資本主義建立同質化的世界的理想同樣不會成功，社會主義同質化的現代性方案的失敗，不過是為一如既往的資本主義同質化的現代性方案提供了失敗的先例：如果說，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表現為其內部不同文化、種族和利益集團挑戰同質化進程的行動意識形態的「解凍」、民族分離和蘇聯解體，那麼，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建立高度同質化的、資本和分工控制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的行動，同樣不也遭到了更為嚴峻的反抗和挑戰嗎？實際上，從冷戰結束後，1991-95年，僅僅世界地區性軍事衝突就達181起，這些紛爭經常以民族和文化紛爭的面目出現，今天的巴爾幹問題既不是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

在這個意義上，今天那些認為社會主義失敗就意味着人類進入了「世界

自由」的人們忘記了：當今的世界，這不過意味着解了一個「套」，卻進了另外一個更大的「套」；意味着擺脫了一種「反抗同質化的同質化進程」，而進入那個徹底的「同質化」進程。如果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命運表現為：它是為了反抗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和資本主義同質化世界而建立的一種同質化體系，一種在擺脫陷阱中落入陷阱的悖論行為的話，那麼很多人今天對社會主義失敗的歡呼，僅僅是對社會主義反抗資本主義同質化行為失敗的歡呼，是對「反抗」的失敗的歡呼，而不是對整個世界日益同質化的批評和反思。或者說，他們正好是為同質化的勝利而歡呼。如果說這種同質化是現代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深刻根源的話，他們如果不是在為一種新的專制主義而歡呼，那麼，今天又用甚麼來解釋他們那樣的理直氣壯和自鳴得意呢？

今天，跨國資本主義的確採取了許多新的戰略，比如，它們更愛強調地方性、特定的文化習俗，但是這種重視和強調，就像麥當勞和微軟的產品充分地方化一樣，是與建立和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是一致的，是與建立跨國的世界市場壟斷是一致的。今天，在美國戰略裏面，文化特殊性的字眼一再被強調。但是，一方面，其目標是為了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個「種族純潔的阿族共和國」；另一方面，破壞原有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是為了服務於美國推行的拆除國家利益壁壘，建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建立高度同質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目標。今天，甚至民族化、地方化、文化多元主義和承認的政治，也都成為建立一個完全相反的同質化世界的工具，這的確是一種新的現象。

那麼，在反抗資本主義同質化世界體系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的同質化體系解體之後，人類向何處去呢？答案可能就是被組織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但是，實際上，只要那個同質化的體系還在，並且是加強了，那麼，「自由」的可能性就會很小。前南斯拉夫問題就是一個生動說明。而且，這個同質化的體系同樣也沒有能力平息這些差異和紛爭，在這個意義上，儘管當代資本主義的確是在完成建立一個高度同質化世界的「未竟之業」。但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同樣不過也是一廂情願，到頭來，它很難擺脫前社會主義曾經有過的命運。

由於掌握資料的限制，我對某些具體事變的看法一定存在偏頗，但是，我相信這些偏頗將成為有意義的討論的某種契機。這為我的非專業的看法提供了存在可能。我認為，今天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要加入的「自由世界」，同樣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組織化的世界，其組織方式可能不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或者政黨組織和意識形態的，但是，卻是一個由金融和資本主導的跨國勞動分工體系。其管理階層是一個跨國的資本階級。對它們來說，這就是解了一個「套」，進入另一個「套」。於是，兩個致命的結果產生了：一、全球經濟共同體的幻象瓦解了民族國家內部平等參與政治的公共領域，把人們的興趣引向了與之相應的經濟活動；二、操縱世界經濟的七國集團進而操縱世界政治，這就是科索沃問題形成的“7+1”方案開的先例。「聯合國」和「萬隆會議」憲章所奠定的「小國弱國應在國際事物中擁有發言權」的原則徒變空文——當年，是亞非拉「窮兄弟」把新中國「抬進了聯合國」，但今天，當中國大使館被轟，亞

非拉兄弟又是如何反應的呢？——與那些全球資本主義的歡呼者不同，我認為，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更沒有弱者和窮人發言權的、更不民主的「封建社會」。

簡單說，假使「天伐者必先自伐之」，我認為在所謂全球經濟共同體的圈套裏，最容易上套的就是韋伯 (Max Weber) 所謂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

讓我們看看並非與我們無關的印度尼西亞排華和內亂。作為亞洲經濟危機的最慘重的結果，國際的和國內的反動勢力蘇哈托家族，把經濟崩潰成功的轉嫁到這個不成熟的民族和民族國家頭上。為了在危機中爭奪最後的生存稻草，這個國家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內戰。佔這個國家人口大多數的人們，其所作所為完全與任何「政治能力」無關，相反，他們使國際社會懷疑他們的文明程度，這是野蠻人的作為。但是，華人，關鍵是華人的命運。有人懷疑印度尼西亞華人的經濟能力嗎？沒有。但是，他們的政治能力如何呢？事實上，他們是沒有任何政治能力甚至地位的，儘管他們有錢。不但如此，他們還自以放棄政治權力為得計。歷史上，就是他們曾經支持蘇哈托反動獨裁統治，為的是希望獲得他的「保護」！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種族滅絕，恰恰不是經濟自由化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可以解決的，而是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貨幣金融自由化造成的一個惡果。

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慘狀，使他們成為世紀末猶太民族悲慘命運的複製。但是，他們卻成不了偉大的猶太民族。因為那個民族，那個天生有經濟頭腦的民族，終於在血泊和殺戮中成熟了，明白了甚麼是自由，明白了必須把對民族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權力的爭奪置於一切利益之上。他們終

於成為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知道與其含羞忍辱做夏洛克，遠不如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高舉以色列戰旗衝鋒陷陣更堂堂正正，活得像個人樣。這個民族終於自由了，——而知道何謂自由和自由的可貴，知道共同體的自由高於一切民族有福了！

也是因此，我最終不想諱言我對中國知識界的批評態度，這個階層一直自詡為開風氣之先。儘管我是這個階層中的一員。我想說韋伯所說的「侏儒症」對眼前經濟利益的追逐和政治素質的下降，完全適合描述我們自己。無論是在內部還是外部，以「順從」換好處和利益注定了他們的性格和處事哲學，實用和實利是他們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我們能夠相信讓這些瞻前顧後、戰戰兢兢、偽裝中正平和的人來充當摩西嗎？今天，當新的八國聯軍進駐南斯拉夫時，我不知道裴多菲 (Sándor Petöfi) 在世該作何感想。因為我十分懷疑他的詩歌已經被改寫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好，若為金錢實利故，二者皆可拋！

當今世界呼籲一個開放的國內和國際的政治領域的重建和改造，以接納和包容不同種族、文化和性別共同體的平等要求。但是，全球資本主義以建立世界經濟共同體的名義，建立的卻是一個在文化和價值觀上高度同質化的世界。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是保證經濟個人的公開自由競爭，但是，當今世界的真實情況卻是，無論在前社會主義還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種族、文化和價值的權力，這個方案對那裏的人民是否行得通，實在大可懷疑。作為其極端反面的當代世界的種族分離主義運動，目標甚至完全也不是重建自由人的想像的共同體，而是建立一個種族純潔的同質化體制。實際上，僵

化的理解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拒絕對這些原則進行改造和開放，就只能使自身變得更加封閉，為未來的危機埋下隱患。而某些人今天的態度不好說明這一點嗎？今天，有人把中國百姓的抗議活動視為「民族主義」，在這些人的詞典裏，民族主義天然的是自由精神的對頭；但是，他們不但完全忘記了人權和福利社會是社會主義者和左翼鬥爭的目標，而且也忘了民族國家既不是經濟利益構成的公司，也不是種族同質化的部落，而是自由人締約的想像的共同體。而今天，正是這些抗議之聲體現了對民族發展的長遠利益的思考，體現了對當今世界經濟歧視背後的文化、民族和階級歧視的自覺（例如，西方對這種抗議的反應很刻意的被引向中國人「偷竊」行為的鄙視。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對抗可能是短暫的，但是文化、道德歧視才是長遠的），表現了在不合理的霸權秩序面前的起碼的政治品質和人的尊嚴。這正是一種自由意志的表達。還有必要再談談一心要當領導階級的中產階級嗎？他們是怎樣把自己的利益與民族自由的利益聯繫起來的呢？是怎樣把自由意志置於自身經濟利益之上的呢？據英國《經濟學家》揭示，我國每年有兩百多億美元的資產轉移到國外。看看貨幣自由化給我們帶來甚麼？韋伯說：「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衝突，並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是的，我十分懷疑，襲擊中國大使館的導彈是用這些轉移出去的錢製造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然不能說他們是自由的民族主義者，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他們看作自由主義者。起碼，不能在韋伯界定的意義上這樣看他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界定自身

為「自由主義者」的現實基礎不但是十分可疑的，而且，其知識和邏輯的前提同樣是相當成問題的。

我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擊我是「自由主義者外部的敵人」的先生們，要千萬倍的熱愛自由。因此，我願意再說一遍：我熱愛自由甚於熱愛勢利和實利。因此我相信，不能用眼前的、可見的和膚淺的經濟利益和好處，去交換一個民族和一個共同體的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空間。今天，是有很多看起來彷彿是隨手可及的好處等待我們去搶、去拿；有很多彷彿是「最後的機會」在誘惑我們這些彷彿是飢渴了很久的人們去選擇庸俗經濟學鼓吹的實用主義，已經為這種哄搶式的散火提供了成千上萬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正是我們內心不可讓渡的自由的召喚，命令我們要忍一忍、想一想；我們忍一忍、想一想，就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去爭取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一個可憐但必須的機會，因為我們注定看不到他們如何在這樣的空間裏發展和生活，所以我們的選擇可能不符合實用主義的原則。但是，它卻符合我們內心對自由的呼喚！正是為了這個呼喚，包括毛澤東、孫中山在內的我們偉大的先行者，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人，在我們的前頭，默默的、英勇的犧牲了。今天，我們英雄的前人召喚我們，讓我們勇敢的站出來，去繼續他們光榮的事業。我們必須直面他們凝視的眼睛。

「亞細亞的孤兒在寒風中哭泣」，「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這是甚麼道理？」——是的，這是甚麼道理？

韓毓海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